

#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 国民政府对美英军事合作的构想及交涉\*

姜 涛

**内容提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为推动与美英的军事合作,采取积极的战略导向。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美英代表针对派军进入缅甸援助英国抗日、建立联合军事会议、制定全盘战略计划等等进行了大量交涉。美英两方无论是出于其本国的战略构想,还是针对中国军事力量得出的判断,都不支持中国的积极战略。因而,从珍珠港事变爆发后短短十几天的交涉,并没有获得多少实质性成果,也没有实现蒋介石等预想的合作局面。

**关键词** 蒋介石 太平洋战争 军事合作 战略

无论是抗战的亲历者,还是如今的史学家,一般都认为 1941 底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中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一直以来孤身抗战的中国从此走向与美英合作抗日之途。既是世界性战争时期,那么军事、外交方面的合作必是此时期三国关系的重中之重。以往学界在讨论太平洋战争时期中美英三国的军事合作互动时,对军用物资分配、史迪威事件、两次缅甸作战着力较多。<sup>①</sup>然而,从 1941 年 12 月 8 日凌晨(中国时间)珍珠港事件爆发至是年底,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曾主动联络美英,重点就盟国军事战略与组织的统一、国军境外作战问题与美英两国代表积极商讨。这不仅直接关系到 1942 年中美英三国的军事合作,甚至还影响了此后四年中国战场、太平洋战场乃至整个世界大战的格局与进展。然而,有关这二十天左右事略经纬的研究成果总体仍显单薄。一

\* 本文获得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才斋奖学金项目“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研究”(CZ201504)资助。

① 代表作有梁敬铸:《史迪威事件》,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Herbert Feis, *The China Tangle: 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New York: Atheneum, 1965); Barbara 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New York: Macmillan, 1971); Charles F. Romanus (eds.)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 D. C.: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United States Army, 1999); Christopher Thorne, *Allies of a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Hans J.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黄道炫:《缅甸战役蒋介石、史迪威的失败责任》,《抗日战争研究》2001 年第 2 期;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全 2 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付辛酉:《不和谐的战时中美军事同盟——以史迪威事件为切入点的探讨》,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2011 年。

方面,早年美英学者(有军方或政府高层背景)或多或少带有殖民主义心态,忽视中方高层的主动性与中国战场的重要性,这一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方史料的缺失所造成的。<sup>①</sup>另一方面,有意思的是,大陆及台湾学者为打破以欧洲中心观为核心的二战史研究,却在有意无意中陷入了“歧视”与“反歧视”的争论困境中,反而影响了史实的重构。<sup>②</sup>

齐锡生的研究是目前有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军事、外交合作最为详实的成果,作者通过阅读对比中美两方的材料,对过往研究做了不少补遗纠偏的工作,可以算得上是挑战西方视角的佳作。在论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军事合作萌发的章节中,齐认为中国并非如美国当局部分人士所认为的那样从此就不认真作战,幻想依靠美国便可获得整场对日作战的最终胜利。其原因一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府高层首先是想拉苏联对日宣战,最初并不急于搭美国的顺风车,二是蒋认为正是因为美英两国未能听从中国的警告,导致其在日本攻击下节节败退,由此希望中国在此后的同盟关系中可以获得更多的发言权,包括加强盟邦组织联系与出动中国军队参战。但美英同盟却存对中国的歧视和排挤,这种先入为主的判断一直影响到二次大战结束后。以此观之,齐著仍是围绕“国民政府是否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仍存有抗战之心”进行论证,虽然在观点上齐著与早年西方学者的论说几乎截然相对,但依旧未能跳脱出前述“歧视”与“反歧视”问题。此外,齐著重点是侧重史迪威在华时期,对大战爆发之初中美英三国互动的考察仍失之简略。<sup>③</sup>

事实上,这种思路很容易陷入单方面研究的陷阱中,中西方学者各说各话,各自从本国的立场出发,难以还原全貌。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间的关系未能得到很好的梳理即是证明。<sup>④</sup>此外,在战时情况下,盟国间无论是合作还是龃龉,平等还是不对等,背后其实涉及的是各国军力、各自战略衡量的差异。过去的研究在论证孰对孰过时忽视了考察各国政策选择、价值判断背后的各项因素。例如,珍珠港事变后,蒋介石与国府高层对整个战争形势走向是如何判断的?这种判断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对美英交涉?美英方面的战略计划如何?他们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角色的等等,这些都是过去研究中语焉不详之处。

本文主要运用台湾“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之蒋中正日记、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档案(AMMISCA File)<sup>⑤</sup>、美英外交档案等,兼及美英两国二战战史,试图重新梳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中国与英国、美国有关军事合作之交涉。

## 一、国府积极的战略构想

过去曾有美国学者提出:日本偷袭珍珠港,实行全面南进后,领导中国人民独立抵抗日本长达四年之久的蒋介石认为,中国很快就能源源不断地得到来自盟军的武器和其他援助,并且他自信能

① Charles F. Romanus (eds.)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Washington D. C.: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United States Army, 1957), pp. 50-57.

② 参见吕芳上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对外关系》,台北,“国史馆”2015年版;石源华等著:《中华民国史》第10卷(1941—1945),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7页;胡德坤主编,王建朗著:《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第5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27页。

③ 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上册,第10—29页。

④ 米德(Rana Mitter)的研究某种程度上较过去西方学者更加注重中国战场的地位,参见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⑤ 本文所使用的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档案(全称US Army Ammisca File: the Magruder Mission to China)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之缩微胶卷复制卷,感谢档案馆茹静老师为本人利用档案所提供的帮助。

在整场大战的战略决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sup>①</sup>而事实上,当蒋介石于1941年12月8日得知日本发动偷袭美军的行动后,第一反应是“抗战政略之成就已达于极点,物极必反,居高临危,能不戒惧”。<sup>②</sup>蒋清楚地意识到,日本南进虽在长远上有利于中国,但要最终实现击败日本,此后必须更加艰苦奋斗。在讲求实力的国际关系框架下,中国作为弱国独立坚持抗战五年,并不必然使她在国际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sup>③</sup>若要彻底实现中日战争世界化,中方必须采取更为主动积极的姿态,配合美英苏等反法西斯国家,而不是坐待他国指挥。

虽然最令蒋介石在意的苏联在对日宣战问题上持消极态度,但是经过短暂犹豫之后,蒋很快便决定对德、意、日三国同时宣战,“用意乃在放弃其无关紧要与侵略暴行之德意,而获得利害密切之英俄也,且得对俄对英对美皆有发言之地位”。<sup>④</sup>蒋为获得美英苏三大国的认可,在宣战问题上表现得较为果断。

当然,国府内部不是没有不同意见。<sup>⑤</sup>不过,宣战后,在政略上积极主动联系美、英、苏,在战略上积极配合美英共同作战,国府高层的步调则颇为一致。在12月8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已决定“召集各国武官,明告其我国军队已准备对香港、越南、缅甸与各友邦军队一致行动,并限期增援香港”,同时“召集军事会议与中央常会,决定国际战争态度与行动”。一为对外取得盟国认可,一为对内求得意志统一。<sup>⑥</sup>

12月12日,时任宣传部部长的王世杰发表谈话,明确军事合作共同行动之重要性。时值德、意两国甫对美宣战,不仅使侵略与反侵略阵线更为分明,而且将远东战场与欧洲战场联合的可能性亦大大提高。对此,王世杰主张反侵略国家首先应迅速成立军事同盟,并随后成立统一的指挥机构,以利于作战。他还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史实来支持其观点,认为1918年4月英、法、美联军建立统一指挥之后,作战能力大为加强。<sup>⑦</sup>

当时身处第六战区的陈诚与王世杰的思路亦颇相似。他认为民主国家与独裁国家相较有松懈迟滞的弱点,要消除此弱点必须“绝对统一指挥”。为中国利益考虑,“今后国家外交方面,亟须迅速促成中、英、美、苏之军事同盟,并肩作战,决不单独媾和,以坚英、美、苏之信念,且以提高我在国际上之地位”。另一方面,陈诚虽对国际外交军事取积极态度,但也认为在国内战场须做局部反攻与全面反攻之打算。<sup>⑧</sup>不出数日,蒋即回电表示“卓见至堪嘉慰”。<sup>⑨</sup>

较之陈诚颇显“折中”的观点,当时正在云南前线主持军务的军令部次长林蔚,显然对国际与国内两者孰先孰后的看法更为激进。他认为国军在今后需将重心放在境外战场,尤其在缅甸战场上要与英军相协同。在援助友邦方面,“必须采取大量有效办法”,如此才能使“战胜后之地位愈见

① Herbert Feis, *The China Tangle: 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 4.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12月8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下同。

③ 蒋介石在日记中记道:“国际间本是利害为主,决无为人牺牲之理,若以此为怪或为愧,则痴矣。”《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12月11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12月9日。

⑤ 王世杰在日记中记曰:“蒋雨岩、朱骝先均不主张立即对德、义宣战。戴季陶对于对日宣战一事认为应慎重考虑措辞。予当时发言最多。予主张对日、德、义宣战,认为此事最好即日宣告”。王世杰著,林美莉编校:《王世杰日记》上册,1941年12月8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395页。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12月8日。

⑦ 王世杰著,林美莉编校:《王世杰日记》上册,1941年12月12日,第397页。

⑧ 陈诚:《电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之认识及处置要点》(1941年12月10日),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下册,台北,“国史馆”2007年版,第504页。

⑨ 蒋介石:《手谕玄蒸电之卓见至堪嘉慰》(1941年12月14日),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下册,第505页。

光荣”。而“国内反攻,似不须亟亟,亦不须全恃兵力,似可利用伪军必然动摇心理,积极宣传,劝诱反正,迟早必能收效”。换句话说,在林蔚的研判中,此后军事手段应侧重国外战场,而国内战场则专注政治活动。<sup>①</sup>

其实,早在珍珠港事变消息传至中国的当日,军令部便拟定了一份军事作战计划,其指导思想与林蔚的签呈可谓如出一辙:

以协力英国固守香港之目的,第七战区于敌人进攻香港时,以主力向广九路敌人侧背攻击,以有力一部相机略取广州潮汕。……以确保滇缅西段交通,并使英美作战容易之目的,于敌人向缅、泰、马来进攻时,滇南、桂西方面,各以一部向越南进攻,以一部由车里方面威胁由泰北向缅甸进攻敌人。另以第五军、第六军进入缅甸,协力英国作战,确保仰光、曼德勒至滇西交通,如英军不能固守仰光时,我军亦须始终确保缅甸北部,巩固中英国际通路。<sup>②</sup>

除了策应英军防守香港外,其余几乎都是出境作战。

虽然针对前引军令部以及林蔚签呈,笔者并未找到蒋做有何种批示的证据,但是12月13日,蒋在下一星期工作预定中记有“规定派缅甸部队与车运计划”和“中英美军事会议之组织”。针对国内战场,蒋则主要关注人事调整。可见,蒋亦有“先外后内”的倾向。<sup>③</sup>

有意思的是,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不断推进,蒋介石的心态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12月10日,英海军主力舰威尔斯亲王号与却敌号被日本空军击沉,加上珍珠港美国海军所受损失,蒋介石据此判断“太平洋上英美海军总力量,已消耗十分之八矣”,且认为“英美在军事太无准备,且徒虚张声势,致遭此败,势所必然”。<sup>④</sup>12月13日,蒋在日记中又记道:“倭果对英、美取主动的攻势,而且果被其闪击成功,此诚出于人之意料所不及。然事后默察,此乃势所必然……英美之骄矜轻敌,毫不戒备,是遭败之非无因,其咎固由自取耳。”<sup>⑤</sup>上述“内心戏”虽专为批评美、英两国,但言语间却透露出了些许自信。至12月14日,日军由泰国侵入缅甸维多利亚角,缅甸形势告急。17日,蒋又认为“如新嘉坡失守,则对倭战争与远东战局,完全要我国负起全责矣,故新港必须使之固守不失”。<sup>⑥</sup>美英在开战初期的节节后退,身为盟国领袖的蒋介石虽然对太平洋上的局势演进颇为担忧,但这也使得那种生怕跟不上美英的“紧张焦虑”有所缓解,继而自信中国能为盟国扭转颓势贡献一己之力。在17日的日记中,蒋不无淡然地记下:“当下战局,无论其如何发展,一时之胜败谁属,我国皆无急迫与积极之必要,一任英、俄、美之迁移可也”。<sup>⑦</sup>

几天后,蒋介石又颇为骄傲地向英国代表魏菲尔(又译卫佛尔,Archibald Wavell)强调:“应承认中国历来对日本之了解比英国较为正确……在英美海空军未能发动反攻以前,最近将来重要负担恐将一如四年半以来之侧重于中国方面陆地上之战线。故目前中国之援英应与此后数月英国援

① 《林蔚电蒋中正续呈关于中国与美英联合作战似可采幕僚体制及利用伪军动摇心理等意见》(1941年12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296-047。

② 《军令部呈策应英美作战意见》(1941年12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103-00060-002。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12月13日,“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

④ 周美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7),台北,“国史馆”2010年版,第652—653页。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12月13日,“上星期反省录”。

⑥ 周美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7),第677页;《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12月17日。

⑦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12月17日。

华之分量相称。”<sup>①</sup>在蒋介石看来,过去是受限于国际环境,无中国表现之机会,而“以后非环境左右吾人之时期,为吾人表现能力之时期,此关打破,吾国家民族始能屹立于世界强盛之地位”。<sup>②</sup>于是,随着太平洋战场上美英两军形势愈发不利,国军高层的作战计划便愈发乐观,中国在对日协同作战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愈发重要。12月20日,军令部制定的一份中美英苏荷五国作战方略中强调:“速以英美荷中之合力巩固南太平洋各要地,同时准备于明年X月以美国海空军及中国陆军为主攻,以英国海空军及苏联陆空军为助攻,先扑灭敌人全部空军,领有制空权,然后对敌本岛及中国东南东北地区,以外线态势向敌人合击而溃灭之”。该方案预计1942年内便可击败日寇,然后盟国再集中全力击败德意两国。<sup>③</sup>不过,战略构想要付诸实施,必须以实力为保障,尤其需要大量随时可以调度且战斗精神旺盛的预备部队和足够展开大规模行动的武器装备。1940年,国军的战斗力已急剧下滑。<sup>④</sup>至1941年下半年,情况仍未好转。<sup>⑤</sup>身为军令部部长的徐永昌考虑到战力下降、预备队不足的情况,倾向暂缓积极动作的主张。<sup>⑥</sup>只不过,就蒋介石及其他持积极态度的国府要员来看,军事因素的考量似乎不及政治因素、国际关系因素的影响。为使中国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尽快实现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的勾连,主动积极的战略构想不失为重要一策。但这一牵涉多国的计划要推动实施,还需要获得英、美的认可与支持。

## 二、入缅交涉的顿挫

日本南进后,蒋介石和国府高层要员在思考战略大势的同时,也试图将战略构想落实到实践层面。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主动提出与美英两军联合作战,进而建议成立联合军事会议、制定全盘作战计划。在蒋介石的思虑中,由于时局紧迫,必须抓紧一切机会,通过各种渠道,向驻重庆的美英代表以及美英当局提出计划。早在12月8日,苏联立即对日宣战的希望还未完全破灭时,蒋介石便召见美英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John Magruder)、戴尼斯(又译但尼斯,Lancelot E. Dennys)及苏联军事顾问崔可夫(Vasily Chuikov),询问联合作战问题。徐永昌日记记录下了整个过程:

① 周美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7),第706、708页。

② 《王子壮日记》(手稿本)第7册,1941年12月24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358页。

③ 《军令部电蒋中正美英苏荷中五国协同作战总方略》(1941年12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20300-00016-024。

④ 徐永昌在日记中记道:“我军战斗力近来表现益觉不济,此次襄河西岸作战,据报除十八师之两团在宜昌城郊尚能支持两日外,余部几于遇敌即避”。《徐永昌日记》(手稿影印本)第5册,1940年6月14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以下简称《徐永昌日记》),第341页。

⑤ 在日军并未发动类似战争头两年的大规模进攻作战,仅以小部队在各战区轮番扫荡的情况下,国军仍是“处处立于被动地位”,“未能有一次之反攻,始终任敌来攻”。蒋介石无不痛心地说道:“我军屡次出击计划,亦未能实施一次,此不惟使敌气日张,而且为我革命军在战史上最大之耻辱。”《手示徐永昌切实研讨实行如何使国军由被动转为主动》(1941年6月1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20300-00004-072。此时,美方对国军战斗力的判断亦大致相当。1941年6月来华之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to China,简称AMMISCA)认为,1939年以后中国方面经常只有一个战区在进行有效的战斗。无论是部队分散驻防的状态,武器的匮乏,还是中央与地方杂牌的不和,所有这些元素都极大地削弱了国军的战斗力。美国战争部(War Department)根据多方情况综合得出结论,“中国这一支杂糅的部队,虽有相当潜力,但时下仍不是一支高效、训练有素和严以守纪的部队”。参见Charles F. Romanus (eds.)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 32-35;英国对国军战斗力的评价更糟糕,认为美国过高地估计了中国的军事力量。参见J. M. A. Gwyer (ed.)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United Kingdom Military Series: Grand Strategy*. Vol. III, Part I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64), pp. 410-411。

⑥ 徐永昌的观点是“对港、对越、对缅,余皆主被动”。《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1年12月8日,第284页。

委员长略询中、苏、英、美如何联合作战,但谓诚有必要,马谓此时仅海战时期,委员长以为大陆沿边似亦需要,马谓也须俟海战告一段落,继谓有三点中国应注意,一、救香港(过去我有计划通知英方,彼方决心守香港);二、进越威胁敌人;三、敌攻缅甸时如何援助,但谓因加拿大军来一旅,才拟守港九,不过恐难久守,若一月或可守。马谓关岛亦然,恐守不住,继谓美国今时固然先要吃亏,但在美国政治方面却又很大功用,总之三个月内恐英、美总是吃亏的。<sup>①</sup>

美方代表马格鲁德则认为当下仍以海战为主,对联合作战并不积极,只希望中方注意港、越、缅。英方代表戴尼斯则认为联合作战有必要。不过美英双方都对抵挡住日军当下的攻势持消极保守态度。

翌日,蒋介石再令何应钦向戴尼斯、马格鲁德试探其对联合作战的态度。下午,何应钦、商震、杨宣诚、刘斐与戴、马二人交换了意见。何应钦开场便声称,“蒋委员长已决定将所有资源投入到这场大战中,吾人并不奢谈理论,而是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当下最关键的问题用一句话可以归结为“中国该如何援助(美英)”。<sup>②</sup>

会谈主要涉及增援香港和增援马来半岛、缅甸两方面。在军援香港问题上,双方并未有太多的分歧。在交换了各自的计划之后,尽管中方指出为顺利保证中英在九龙联合作战,最好有英国空军支援,但何应钦、刘斐还是强调无论有无空军配合,中方将尽全力向九龙进发。然而,一涉及马来半岛、缅甸方面,中英的分歧就凸显了出来。在何、刘二人试探下,戴尼斯直截了当地陈明,英方需要中国的援助有直接性的和间接性的两种。直接性的援助即国军出境作战,但英方在缅境内最多只能提供一个团的补给,余由中方自主筹措。但如有可能,国军应向印度支那出击。间接性的援助即国军在中国各处发动牵制性攻势,使日军不得他调。这在戴尼斯看来具有极大的价值。美方代表马格鲁德亦表赞成,并强调中方需向印度支那方面的日军施加最大的压力。马同时认为日军不大可能由陆路进攻缅甸。<sup>③</sup>

列席观察的徐永昌意识到,戴、马二人“对联合作战问题不甚接谈,但尼斯对我援缅问题亦不甚接受,仅希望我间接援助,最好入越”。<sup>④</sup>当日,蒋介石根据会谈情况,通过宋子文向美当局转告“对香港已积极增援,对安南亦决进击”。<sup>⑤</sup>

不过,当时援助香港英军的部队已在积极准备,而进入越南境内截断日军后路的计划由于牵涉到法越当局和维希政府,颇难解决。<sup>⑥</sup>故随后交涉重点转向为获取英方对国军入缅的许可。

12月10日,戴尼斯正式向蒋介石提出协防缅甸:“一、普洱之国军,由一团增至一师;二、驻在车里之一团,调至缅甸孟扬;三、抽调一团至畹町,战事发生时,准备用于缅甸景东方面。”<sup>⑦</sup>英方只需要中方派遣一团入缅,用于缅北方面,另用一师和一团于边境待命。此方案实际与1941年7月

① 《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1年12月8日,第284页。

② “Memorandum of Conference with Minister of War (General Ho Yin Chin)”, 10<sup>th</sup> December, 1941, US Army Ammisca File: the Magruder Mission to China (hereafter as AMMISCA),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缩微胶卷复制卷,下同。

③ “Memorandum of Conference with Minister of War (General Ho Yin Chin)”, 10<sup>th</sup> December, 1941, AMMISCA.

④ 《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1年12月9日,第285页。

⑤ 《蒋委员长自重庆致驻美代表宋子文嘱转告美国当局希望美国坚决表示必先用全力解决日本以转移苏联心理电》(1941年12月9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43页;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to Dr. T. V. Soong, 9<sup>th</sup> December, 194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after as *FRUS*), 1941, Vol. 4, p. 740.

⑥ 《傅秉常接见博德法政府对于中国军队通过越南可能性问题四项答复》,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20300-00045-074。

⑦ 《蒋委员长接见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戴尼斯将军商谈关于拟具军事联系与合作之具体计划等问题谈话纪录》(1941年12月1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第48—49页。

中英双方商定的合作方案并无二致,即使在东南亚局势大变的情况下,英方仍未改变原定的局部战略计划。<sup>①</sup>

军委会方面,先前负责对英军事交涉的林蔚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首先向蒋签呈,建议驻滇部队入缅与英军并肩作战。为此,他还提出了消极与积极作战两策:消极方面,国军入缅,掩护缅中地区,使英军能集中兵力防守缅南;积极方面,中英联合进入泰国作战,以确保马来半岛。<sup>②</sup>可见林蔚的最低要求亦超过了英方的预订计划。而与此相对,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则对入缅援英持保守意见,主张“援英军之派遣似以比较被动的为佳,因我纵对敌争取主动,而英方视为不亟奈何,且我预备之部队亦无甚太多,将来成绩亦恐未必能为委员长所期望(今日预备者第五、第六两军,果使缅甸吃紧,英方要我多派,我亦不能过四军)”。<sup>③</sup>

蒋介石显然更同意林蔚的观点,对徐永昌的意见“不以为然”。<sup>④</sup>无论英方态度如何消极,蒋仍决心派军入缅,并不断督促何应钦、周至柔等勉为交涉。其出发点“一则缅甸为中国唯一通海要口,二则缅为中国与英美联系之唯一要道,不可坐令其失陷,而使我与英美隔绝,又陷于孤立无援之境,易为俄所胁迫也”。<sup>⑤</sup>而且,英方越是消极,可能在蒋看来便越坐实他此时的判断,即英、美两国太无准备,中国能在远东战场做到英美此时不能做也做不到之事。派兵入缅此时已成为蒋的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英国高层也在制定关涉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的大战略。在丘吉尔和其参谋团看来,嗣后最急迫之事,乃为确保在美国参战后依旧能“获取足够多的军事物资”,同时在欧洲取攻势,在太平洋方面取守势。<sup>⑥</sup>蒋介石入缅援助英方的计划实际上正是急人所未急,不幸为徐永昌“英方视为不亟”之语所言中。

12月15日,蒋与马格鲁德、戴尼斯和英国大使卡尔(A. Clark Kerr)再次会谈。会谈伊始,戴尼斯便提出四点请求:“一、缅甸军事紧急,拟请下令以全师兵力开入缅甸;二、拟请下令,命驻云南军队抽一师待命,于必要时立即开入缅甸;三、拟请下令,命希诺德部下志愿军留缅参加保卫缅甸战役;四、准许敝国动用一部分美国租借法案下留在仰光之军用器材。”<sup>⑦</sup>英方希望中国派出的部队仅

① 1941年7月,戴尼斯在与商震、林蔚的会商中,提出中方派两师待命于中缅边境,一旦日军进攻缅甸,中方两师便由该方面出击敌人之侧背,并请求中国届时提供武器与空军支援。《商震等与戴尼斯举行中英联合军事行动谈话四次纪录》,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20300-00040-005。

② 《林蔚电蒋中正请移滇境军队入缅泰协助英军对日作战》(1941年12月1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296-048;《林蔚电蒋中正日军主力固用在南洋必有一部同时入缅》(1941年12月1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20300-00019-001。

③ 《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1年12月15日,第291页。

④ 《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1年12月15日,第291页。

⑤ 周美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7),第676页。

⑥ 在珍珠港事变后,丘吉尔在参谋会议上得出的战略判断是,虽然当下日军占优势,但仍是次要敌人,他的主要价值在于使盟国抽调已在欧洲集中的大量对德部队。在美国参战,美军迅速扩大军备的情况下,英国应想方设法在资源分配中获得尽可能多的份额。在前往华盛顿参加阿卡迪亚会议的途中,丘吉尔草拟了一份备忘录,详细地列具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战略。丘认为“日本人占有海军优势,这使得他们能将部队输送到任何他们想输送的战略要地”,“盟国在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力量与敌军开展全面的舰队作战”。尽管“盟国不能在广阔的海域开展持续的行动”,但没有海上优势的盟军依旧能处处出击,损耗日军,因为日本已经消耗不起资源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让日军在其海外占领地保持尽可能多的部队,使他们尽可能地忙于加强交通线,并保持空军飞机的高损耗率”。参见J. M. A. Gwyer (ed.)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United Kingdom Military Series: Grand Strategy*. Vol. III, Part I, p. 317, pp. 329-330。

⑦ 《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将军等商谈关于订定军事合作之全盘计划与保卫缅甸等问题谈话纪录》(1941年12月15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第62—63页。

由一团增至一师,与中方期望之两个军仍相去甚远。而戴尼斯同时期盼蒋能允诺租借物资与美空军志愿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这恰恰符合英方高层“获取足够多军事物资”的战略导向。

蒋对此并未做过多回应,而是“强将商讨问题转向联合作战计划”。<sup>①</sup> 他向马格鲁德、戴尼斯提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战略设想,建议“应尽量抽调印度、缅甸之部队,集中全力以保卫星加坡,缅甸防务如有不足,则藉中国之部队以补充之”。蒋认为,先前英方允许国军入缅的一师兵力,完全不足保卫缅甸,若要实现战略目标,至少需要增至一军。同时,他还强调,虽然新加坡、缅甸的防御十分重要,但是绝不能坐视日本在越南、泰国建立进攻根据地。然而,一旁的戴尼斯只回应物力不够,便又将话题转向美国空军志愿队援缅事,而英国大使亦在从旁助势。<sup>②</sup> 对此,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愤愤然道:“英使及其武官等之卑屈之态,莫能形容,而其贪小讨利,仍不注重全局与大体,则与前无异。”<sup>③</sup>

12月22日,蒋介石与甫至重庆的英军将领魏菲尔<sup>④</sup>、美空军将领勃兰德(George Brett)会面。此时蒋的战略打算较之数日前更进一步,提出最好“发动中国与印度军队进攻泰国,借以解星加坡一部分之围”。魏菲尔虽然原则同意蒋介石这一“以攻为守”的主张,但强调在当前需先巩固缅甸境内的公路和海港,使其免受日军侵袭。<sup>⑤</sup>

22日的会晤毕竟是与蒋初次见面,魏菲尔还有所保留,蒋对魏菲尔的印象亦不太坏。<sup>⑥</sup> 原定23日下午开始中美英三方代表正式召开联合军事会议,在23日中午的预备会议上,魏菲尔向何应钦直截了当地指出,英国与中国一样关心缅甸的防务,但要防守缅甸必须启用存放在仰光的原属中国的租借物资(主要包括武器弹药、通信器材、卡车等等),以弥补在缅英人军用物资之不足。面对急于向中方求得物资的魏菲尔,何应钦不无深意地回复道:“以中国本土工业目前的状况,只能生产很小一部分轻武器,所有生产原材料需从外国进口;此外中国只能自主生产一小部分通信器材;至于卡车,中国无法生产,完全依赖进口。”魏菲尔颇为耿直地说:英国并不需要中国部队(的援助),利用自己的部队应该就能守住缅甸,中国的部队最好可以用于他处。魏认为他完全理解向中国索求租借物资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但他如此做也是出于对双方共同目标的考量,暂时挪用物资同样符合中方的利益。最后,这场原定商讨联合作战、制定全盘战略计划的两个多小时的预备会议(详见下节),几乎全程都在讨论租借物资问题。<sup>⑦</sup>

当日下午的正式会议上,蒋再次向魏菲尔试探出兵援缅之可能性,得到的却是魏菲尔略显强硬的回复:

①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15<sup>th</sup> December, 1941, FO-371-27753, p. 53.

② 《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将军等商谈关于订定军事合作之全盘计划与保卫缅甸等问题谈话纪录》(1941年12月15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第62—63页;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15<sup>th</sup> December, 1941, FO-371-27753, p. 53.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12月15日。

④ 魏菲尔此行的目的,虽起因于蒋要求与美英代表商讨联合作战计划及建立军事会议,但在英国战争部给其的指示中,主要是为赢得蒋介石的信任,并争取说服蒋将美空军志愿队留在缅甸。From War Office to Commander-in-Chief, India, 18<sup>th</sup> December, 1941, FO-371-27753, p. 62.

⑤ 《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英国军事专使卫佛尔及美国军事专使勃兰德等磋商军事合作问题谈话纪录》(1941年12月2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第79—81页。

⑥ “印度英军总司令魏菲尔与美国军事总代表勃兰德二人,昨夜初次来见,甚感觉美国人之浮浅与英国人之阴沉,所以美国人处处表现其落在英国之后,而非事事受英领导不可。观乎勃之于魏,如鸡之伏狼,其形状与心理,殊可怪也,甚矣。英人外交手段之毒辣与灵敏,亦可佩也。”《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12月22日。

⑦ “Memorandum of Conference with General Ho Ying Chin, Minister of War”, 23<sup>rd</sup> December, 1941, AMMISCA;徐永昌在日记中亦记录了会议经过,参见《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1年12月23日,第300—301页。



深盼钩座再派部队入缅问题,当视该印度增援部队能否及时赶到而定之。倘彼等能及时赶到,则中国所派上述四十九师及九十三师部队以外之军队,尽可调充中国他处军事行动之用。更有一点,应请注意者,在各处牵制日军,使之忙于应付,亦有其重要性,不容忽视。窃意中国如准备未周,绝无急于在各方面发动反攻之必要,而日军在中国之交通,则应加以有计划、有步骤之破坏,俾其不能抽调中国部队派他处更重要之战场。<sup>①</sup>

魏菲尔不愿国军入缅境内作战,有其站在英帝国立场上的考量,认为“让帝国军队保卫缅甸显然比中国军队更好”<sup>②</sup>,亦有最大限度获取资源的动机。相比作战,迅速集中资源在英方的战略计划中拥有更高的优先性,中国军队如进入缅甸,则不仅可能会消耗英方原本就少得可怜的资源,还可能使英军无法全部借用仰光的租借物资。<sup>③</sup>

此外,当时美国根据各方情报判断国军“缺乏重要军事反攻或远征所需的积极进取精神、训练、武器和装备”,并由此对蒋介石提出出征缅甸的建议同样持消极态度。<sup>④</sup>而且,与英方观点相似的是,美国军方也认为日本得以南进,是从中国战场抽调了大量部队,中国的重要战略价值在于其于国内战场发动牵制性的扰袭,以使日军后方不稳,战线全面紧张。<sup>⑤</sup>国军急于入缅,而在国内战场并无牵制日军、主动袭扰进击之表现,在美方看来这反而是不愿积极作战,坐待盟军胜利之表现。<sup>⑥</sup>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蒋介石及其幕僚在珍珠港事件后尤为积极,急于将中国的命运与美英苏等大国捆绑起来,试图使美英的战略重心从欧洲转向太平洋。蒋不断向英、美双方代表提出入缅事宜,一方面的确是在美英防守吃紧的情况下,自信能为战胜日本做出贡献。另一方面,蒋也担心日军迅速攻下缅甸,切断中国与外界的联系,因此要不顾一切以保持国际通路,确保不与美英断绝联络。蒋介石与国府上下并非没有积极作战的意愿,只是在无美英持续援助的情况下,战力低下的国军在国内战线亦难有作为。原先蒋曾答应将存放仰光的租借器材借与英军使用,但是英方并不给予“允许国军入缅”的道义互惠。于是,在会谈中,蒋便用颇带“愤怒”的语气强调道:“中国如不能支持其战线,全部保卫缅甸之计划亦将瓦解。予确认保卫缅甸自有其价值,惟租借法案器材中国自有应享之权利,亦望勿加忽视。”<sup>⑦</sup>

① 《蒋委员长在重庆召集美、英、澳等国代表及参谋总长何应钦等举行第一次联席军事会议决议在重庆成立一永久分区分军事委员会并通过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会议纪录》(1941年12月2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第85页。

② J. R. M. Butler (ed.)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United Kingdom Military Series: Grand Strategy*. Vol. III, Part II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64), p. 421.

③ “Memorandum of Conference with General Ho Ying Chin, Minister of War”, 23<sup>rd</sup> December, 1941, AMMISCA.

④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to Secretary of State, 14<sup>th</sup> December, 1941, *FRUS*, 1941, Vol. 4, p. 754.

⑤ 《蒋委员长在重庆召集美、英、澳等国代表及参谋总长何应钦等举行第一次联席军事会议决议在重庆成立一永久分区分军事委员会并通过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会议纪录》(1941年12月2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第91页;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to Secretary of State, 14<sup>th</sup> December, 1941, *FRUS*, 1941, Vol. 4, p. 754.

⑥ 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曾多次向军委会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提及,日军抽调中国战场军力才得以南进,但俞大维并不具体回应。军事代表团参谋长麦克摩兰(MacMorland)由此得出印象,中国方面可能不会向日军发起进攻,将坐等盟军胜利,并在战后用盟国给予的军事援助解决中共。Charles F. Romanus (eds.)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 53.

⑦ 《蒋委员长在重庆召集美、英、澳等国代表及参谋总长何应钦等举行第一次联席军事会议决议在重庆成立一永久分区分军事委员会并通过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会议纪录》(1941年12月2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第91页。

英方并不积极支持国军入缅作战,因此12月15日以后,蒋介石的交涉方式也有所改变,入缅作战逐渐成为次要议题,而重点转为争取美英代表对制定全盘战略计划和成立联合军事会议的支持。入缅作战在蒋看来仍是局部战场问题,而一旦开始制定总体战略,设立联合军事会议,那中国方面就能影响整个太平洋的战略,甚至能影响欧洲战场,如此入缅作战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 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在入缅交涉的同时,蒋介石也与美英两国积极商议建立联合军事委员会,制定全盘战略计划。12月8日晚,正在美国负责联络事宜的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认为情势巨变,过去曾酝酿的整体计划似已可正式推动:

屡奉函电指示,中英美等应有军事上共同组织,目的在军事动作有整个计划,物资供应有完备之统监筹措等因。虽不时推动,因美国尚未参战,颇难成功,今美日战事爆发,拙见亟宜趁此时机,请钧座电致总统及邱吉尔,提议此举……电中所称中英美等组织军事最高委员会,由美国主持一节,英方要人已暗示赞同。<sup>①</sup>

两日后,蒋介石将中方拟具的整体计划,分别转交马格鲁德、戴尼斯。其四点如下:

- 一、由华盛顿建议五国联合军事行动之具体计划,以华盛顿为政治及军事之中心点。
- 二、在苏联未宣战前,由华盛顿建议香港、菲律宾、星加坡、缅甸、荷印区域间之四国联合军事行动之具体计划。
- 三、四国初步谈判之集议地点应为重庆,其永久地点则再行讨论决定之。
- 四、由华盛顿建议五国军事互助之协定。<sup>②</sup>

与此同时,蒋还通过美国顾问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向罗斯福的秘书居里(Lauchlin Currie)阐述全盘计划及联合会议之重要性,强调唯有此方法才能“破坏日本中心地位之便利及其个别击破民主国家之能力”,也唯有此方法才能维持威信,弥补战争初期之挫折。<sup>③</sup>

在蒋介石的眼中,盟国间无合作、无联系,较之轴心国之合作无间,令人分外担忧。太平洋战争爆发数日后,各盟国仍然未能决定在军事上如何联系,应设立何种组织。“今日之抗敌,只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应付,最不足训”,“英、美双方,只知招架日本所施之棒击,未闻有如何立于主动地位一举击毁其南进根据地之计划”。蒋生怕日军能集中兵力,利用美英涣散无联系且军心低落之际各个击破,因而建立盟国间具体联系与合作计划,对蒋而言是“时不我待、稍纵即逝”。<sup>④</sup>

① 《宋子文电蒋中正与美英苏荷等国商讨军事合作当前军事情势及拟协商作战计划纲领等协商情形》(1941年12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103-00056-002。

② 《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商谈关于由美国建议五国联合军事行动之具体计划等问题谈话纪录》(1941年12月10日)、《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戴尼斯将军商谈关于拟具军事联系与合作之具体计划等问题谈话纪录》(1941年12月1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第47、48—52页;Charles F. Romanus (eds.)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 51.

③ 周美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7),第650—652页。

④ 《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戴尼斯将军商谈关于拟具军事联系与合作之具体计划等问题谈话纪录》(1941年12月1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第51页。

此时,远在华盛顿的罗斯福也在思考如何将美国的战略与各大国的计划联系起来,以共同对日。在收到蒋介石的全盘计划建议后,罗斯福便立即提议在远东同时举行由美、英、荷、中四国代表组成的两场军事会议:一场在重庆,商讨在亚洲大陆的战略;另一场在新加坡,决定南太平洋上的战略。美国战争部在给马格鲁德的说明中强调,重庆、新加坡两军事会议之目的在于制定计划,以在各战线牵制日军,防止其集结部队攻克一个又一个的战略目标。<sup>①</sup>12月16日,罗斯福致函蒋介石,建议由蒋主持于17日在重庆召集的联合会议,“并希望此等初步会谈或可发动产生一永久机构,以设计及指挥我等共同努力”。<sup>②</sup>

12月17日,虽然参加重庆军事会议的英国代表魏菲尔、美国代表勃兰德还未抵达重庆,但蒋介石仍然召集美、英、苏军事代表,初步制定了所谓的五国军事代表会议大纲:

一、设立联合作战机构,其名称为军事代表会议或参谋团。二、集会地点:重庆。三、由美国总代表主持之。四、任务如下:甲、关于远东各战区之联系。乙、研究全般情况(西欧、远东)并转达各战区之情报。丙、商定英、美、苏、荷、中五国对太平洋整个作战计划纲要。丁、迅速决定英、美、荷、中共同保卫星嘉坡、菲律宾、香港、缅甸、荷印具体计划。戊、根据丙项拟定各战区内作战方案……<sup>③</sup>

这一大纲要求重庆联合军事会议的任务既包含远东各战区内的联系,还需研究包括西欧、远东的全局。其事实上超出了罗斯福将之限定为亚洲大陆地区战略指导机构的设想。<sup>④</sup>而同时在新加坡召开的联合军事会议,却只主要商定了南太平洋区域的宏观战略目标,即视新加坡为首要战略目标,而以防守菲律宾,维持菲律宾和马来半岛间的海空交通线为次要战略目标。会议并确定了设立该战区总指挥之必要性。<sup>⑤</sup>

蒋介石从自身判断出发,急于避免盟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病,除考虑本战区问题外,还将其他方面战场纳入进来,以图加强联络,统筹规划。而从新加坡会议的报告可以看出,美英代表商讨出的结果却似乎又恰恰是蒋介石所担心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其目的在于明确各战略要点的主次先后,而并不急于制定具体作战计划,更不考虑战区间的联络问题。蒋介石的所思所虑更像是指导欧亚全局的罗斯福,而罗斯福期待蒋介石的角色却只是一战区内的统筹人。这种身份错位与思考方式的差异在之后的合作交涉,以及相互间的认识中造成了极大的误解和不便。

如上节所示,美英双方对中国的战略角色已有明确的定位,即通过中国战场内对日军不断的扰袭,使日军难以抽调兵力在南太平洋发起全面进攻。尤其是英方,对国府方面能否在国内战场发动

① Maurice Matloff (eds.)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 The War Department: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 - 1942* (Washington D. C.: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United States Army, 1987), pp. 85 - 86.

② 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6册,台北,“国史馆”2014年版,第684页。

③ 《蒋委员长自重庆致驻美代表宋子文告知与美、英、苏军事代表讨论之五国军事代表会议大纲电》(1941年12月19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第74页;“Memorandum of Conference with the Generalissimo on Dec. 17, 1941”, Dec. 18, 1941, AMMISCA. 据徐永昌日记记载,此会议大纲基本由蒋介石自拟。参见《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1年12月17日,第295页。

④ 12月23日的会议上勃兰德指出此点问题:“亚东范围到南洋太大,因新加坡当另有一会议……泰国及以东应在重庆会议区内,新加坡会议应以本半岛及其南东,此即罗总统关于重庆区域之意见也。”参见《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1年12月23日,第302页。

⑤ Louis Morton (e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 The War in the Pacific: Strategy and Command: The First Two Years* (Washington D. C.: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United States Army, 2000), pp. 156 - 157.

有效牵制攻势极为在意。罗斯福提议在重庆召开联合会议,可能一开始便有通过此会议推动中国在其国内发动局部性攻势的企图。<sup>①</sup>不过,美方对重庆联合会议的战略指导意义显然抱有更大的期望,在会议召开前马歇尔曾专门指示勃兰德,让其鼓励诸位与会者,充分利用日军“战线过长”之良机,保证在各个战线上给日军施加最大的压力。同时,也要让中国安心,让其看到美国绝不放弃菲律宾以及他在亚洲的盟友。<sup>②</sup>

除了全盘战略与局部性战略的差异外,蒋介石与英方代表在长远战略抑或短期战略的择取上亦有较大分歧。戴尼斯认为蒋“所建议者为一目光远大,规模宏伟之组织,而本人所拟者则比较简小”。蒋介石反驳道,无论赋予该军事组织何种名义,必须从长远考虑问题。除随时应付日军攻击外,更要彻底研究如何摧毁日军在泰国、越南等地的根据地。<sup>③</sup>12月15日,戴尼斯希望中方速派一师军队入缅(此时蒋对入缅已不如之前积极),认为不必等到整体合作计划完成后才行动,盖“订定整个计划,需要时间,而局势迫切,必立有行动,始可挽救”,“敌不待我,时机已迫矣”。<sup>④</sup>

在12月23日正式召开的重庆联合军事会议上,蒋介石与英、美两国代表的分歧极为明显。尤其是蒋与魏菲尔之间,整场会议基本是各说各话,两方事实上并未达成任何有成效的合作计划。蒋介石仍旧强调“中、英、美三国今既并肩作战,自需一全盘整个之计划。我人试检讨过去之行动,大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待事件发生,始仓促应付以与我共同敌人周旋。此后我人计划,自应着眼于整个战区之方位,防卫缅甸亦包括在内,如是则不作六个月之计划,必将犯目标短视之嫌。缅甸之防守固属重要,香港、星加坡之保卫岂容忽视,此皆为本会所应兼筹并顾之处”。而魏菲尔则着眼于借用美国空军志愿队和中国存放于仰光的租借物资,丝毫不想讨论任何大的合作战略。针对蒋介石提出的草拟六个月阶段性计划问题,魏菲尔不仅毫不留情地拒绝,而且直接推翻蒋介石制定全盘计划的设想:“本人反对此举(即全盘计划——笔者注),盖目前根本尚无可以报告之资料……就目前而言,我人既无拟具六个月计划之准备,不如再候二、三星期,俾能得一实际计划方案之为愈也。”<sup>⑤</sup>

美方代表勃兰德则从战区优先权、物资分配的角度立论,希望重庆会议能让美国高层意识到亚洲战区之重要性。<sup>⑥</sup>但是,蒋介石对此并不重视,他坚持认为“各战区之孰急孰缓,应有适当理由与充分事实以为判断之根据”,也就是说进行整体战略判断后,“优先权”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不过,勃兰德似也认同蒋介石的看法,承认应当尽快起草战略计划,从而能“促成给予优先权之刺激,俾

① 时任驻华大使的高斯(Clarence Gauss)尤持消极观点。他认为蒋关于中国能在与轴心国的斗争中起到一定作用的观点,无意中起了误导作用。蒋制定的计划在他看来,是由某种宏大的或者说“象牙塔式”的观念生发出来的,根本“不切实际”。高斯还认为,蒋关于在重庆设立总指挥机构的提议,在当前形势下同样不实际。但是,他也向国务院建议,接受蒋的这个联合军事委员会计划,不过主要是将之用于情报和计划(除重要计划需秘密外)的交流,同时“借以巧妙地鼓励、指导国军开展对驻华日军的军事行动”。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to Secretary of State, 14<sup>th</sup> December, 1941, FRUS, 1941, Vol. 4, p. 754.

② Louis Morton (e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 The War in the Pacific: Strategy and Command: The First Two Years*, pp. 156; Charles F. Romanus (eds.)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 55.

③ 《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戴尼斯将军商谈关于拟具军事联系与合作之具体计划等问题谈话纪录》(1941年12月1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第51页。

④ 《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将军等商谈关于订定军事合作之全盘计划与保卫缅甸等问题谈话纪录》(1941年12月15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第64页。

⑤ 《蒋委员长在重庆召集美、英、澳等国代表及参谋总长何应钦等举行第一次联席军事会议决议在重庆成立一永久分区军事委员会并通过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会议纪录》(1941年12月2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第90页。

⑥ 12月23日上午,美英双方代表包括勃兰德、马格鲁德、魏菲尔、戴尼斯等人进行了一次内部磋商,魏菲尔基本都在谈租借物资与美军空军志愿队,勃兰德即提出“战区优先性”问题。他认为一旦确定下本战区的优先性,美国和中国便能接受租借器材转借于英国。“Memorandum of Conference with General Wavell on Dec. 23, 1941”, 24<sup>th</sup> December, 1941, AMMISCA.

总统能明了此间紧迫之需要”。<sup>①</sup>

蒋介石在当日的日记中记道：“英人之贪诈自私，毫无协同作战之诚意，而对我国之轻视侮蔑，尤为可痛！余不得已乃正色厉声向之责问，始得勉强决议。呜呼！英人之阴狠奸猾，不禁为亚洲前途危也。”<sup>②</sup>其中只字未批评美国人，相较英国人，蒋似对美国代表的合作态度更为满意。

### 余论：吾人表现能力之时期？

会后，蒋自认为中英美三国军事会议之成立，“实为我外交史上空前之创例，是英美有意来华迁就，而非我有求于彼也”。<sup>③</sup>英美真是否“愿意迁就”，仍有待讨论。而事实上，12月23日的会议基本宣告了蒋寻求总体战略和建立联合军事会议的失败。12月24日，在与美国代表勃兰德早餐叙别时，蒋才道出了“真语”：

远东对倭作战，端在中国之陆军，以配合英美之海空军而协同作战。目下英俄两军之主力专重对德，无力东顾，故美国于租借法案中所允贷我之武器，必须照常运送。其次，中美必须有一联合作战之计划，美国对中国所需用空军之数量，以及可到达之时间，并望及早有具体切实之答复也。<sup>④</sup>

蒋已经把英国排除在联合作战计划之外。而原先计划是为联系英、美两方，与一方破裂，其整个计划亦即告失败。

会后，美军方也对重庆联合军事会议的结果进行了评估。但遗憾的是，美方也认为该会议并未取得实质性结果。较之新加坡会议，重庆会议完全没有讨论指挥权、后勤问题。美军战史认为，这为之后中国与其盟国间的龃龉埋下了祸根，“在未来的三年里，正是指挥权与后勤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盟友”。<sup>⑤</sup>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国民政府勾勒了积极的战略构想，并与美英代表多次交涉。国府高层争取战略构想落实的努力，比以往研究所展现的更为积极、主动。尤其是蒋介石本人不仅在其日记里多有“流露”，自信中国能为盟国扭转战场守势贡献一份力量，而且在实际行动中更是全力推动交涉，试图使美英两国认可中方的战略构想。这种积极姿态一方面确有信心增强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彻底将中国抗战世界化，加强与美英大国的联系。中国独立抗战四年后，无论是国内资源还是军队战斗力，都大幅削弱。太平洋战争的突然爆发，使中国暂时摆脱了孤立无援的困境。但要真正与美英两国实现合作，消除被全面封锁的危机，乃至提高中国对盟国的发言权，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整体实力较弱的中国势必要采取积极的战略导向。无论是入缅作战，还是推动全盘计划、建立联合军事会议，都可以归结到这一点。

面对中方亟不可待的心情，美英两国代表在交涉中却略显消极。美英两方无论是出于其本国

① 《蒋委员长在重庆召集美、英、澳等国代表及参谋总长何应钦等举行第一次联席军事会议决议在重庆成立一永久分区军事委员会并通过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会议纪录》（1941年12月2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第87—89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12月23日。

③ 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6册，第695页。

④ 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6册，第690—691页。

⑤ Louis Morton (e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 The War in the Pacific: Strategy and Command: The First Two Years*, p. 156.

的战略构想,还是针对中国军事力量得出的判断,都更期望中国在国内战场发动牵制日军的局部攻势。并且对英方而言,也有最大限度获取军事资源的考量,更希望得到积存在缅甸的中方租借物资和美空军在华志愿队的援助,而非中方军队入缅作战,与英军“分享”资源。

齐锡生的研究肯定中国积极争取与美国合作的努力,将美当局的消极归结于对中国的“歧视”。笔者并非否认“歧视”因素的存在,但假如我们跳脱出歧视与否的反复争论,不但有助于我们客观地重现史实,而且能明了国民政府与美英两国在战略构想上的巨大差异,已经从根本上排除了中国实现其积极战略的可能性。

这一战略上的根本矛盾延续了整整四年。之后,国军虽远征缅甸,并且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是一旦中国国内战场出现有如日军“一号作战”时的崩溃局面,美英对中国国内战场优先性的判断,便很容易造成对中国作战成绩的根本性否定。可以说,造成这一吊诡局面的远因,便肇始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的合作交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身处前线的陆军第四十一师师长丁治磐于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段话:

何总长有任远东联合军总司令说,果尔则前此余所虑英美之对我玩滑头,今可无忧矣。然我之本身仍要在军事速求进步乃宜。盖今后与邻邦作战,非复以往之败由自败,退由自退,他人可不加责。今则人进我应进,人退亦须我退,若复如今日之军事,将大见讥于友邦。<sup>①</sup>

虽然丁治磐对国军的战斗力和过往的作战精神不无担忧,但是字里行间里仍旧透露出今后为“吾人表现能力之时期”的兴奋感。只是这种弥漫在国府上下的积极心态,很快便因为对美英合作交涉无甚结果而消散殆尽。1942年1月,英国外交人员注意到,英国对日作战的接连失败,中国社会上也流传着英国不屑于接受中国派军人缅援助的消息等等,中国人民的信心丧失殆尽。<sup>②</sup>

身为领袖的蒋介石自然仍是试图扭转美英“以大西洋为主,太平洋为从之观念,以及保守为主,进取为从之观念”。<sup>③</sup>不过,1942年3月间,当日军占领南洋诸重要战略地域时,蒋也曾有此番念头:“以后我国局势,西北重于西南,对内重于对外”;“此后若徒望英、美之力来援取胜,则不可能,惟求如何自立自保,为惟一之道”。<sup>④</sup>而以陈诚为首,在国军高层中亦出现了不少要求“自力更生”的声音,或隐或显,直到抗战结束。<sup>⑤</sup>

[作者姜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郭阳)

① 《丁治磐日记》(手稿本)第2册,1941年12月9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版,第402页。

② Sir A. Clark Kerr to Foreign Office, 28<sup>th</sup> January, 1942. FO-371-31632, p. 106.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1月7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3月13日;《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3月14日,“上星期反省录”。

⑤ 陈诚曾向蒋介石函呈,强调“今国内外若干人士不察,初未计及我国本身一贯之国策,主次战场之区分,与对敌攻击有利之时机地点,暨必要之准备,徒于东欧第一战场及北非第二战场之外,哄然瞩目于缅甸之第三战场。而对我国家民族兴旺根本所关之本国广大战场,反不加措意,如此推演,危险孰甚”。陈诚:《电呈国内外大势并论根本国策》(1942年12月31日),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下册,第537—538页。1942年4月,正当国军远征军开始入缅作战之时,军令部少将参谋万祖章签呈反对入缅作战。他认为:(一)前往国外作战即使成功,亦远不如收复国内沦陷区影响为大,何况舍己从人,万一国内战场紧急,则演变为“后门拒虎、前门进狼”;(二)追随敌人拉长战场,自处被动;(三)英美物资少,难以援助中国,且滇缅运输困难;(四)当利用敌人南进,盟军整军未成,无积极行动之时,积极整理国军,入缅作战反而逐次消耗整军完成之部队,得不偿失。《万祖章有关国境外作战之签呈》(1942年4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史政局及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3074。